

孔子與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比較

胡少偉

香港教育學院

孔子是中國教育史上最為著名的教育家；而陶行知則是中國近現代傑出的教育家之一，要對中國古今教育思想有所了解，認識孔子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看來是頗基本的。本文嘗試在描述兩者生平的基礎上，以比較的方法去分析兩者在教育主張、教學看法和教學哲學等三方面的異同，從中勾劃出中國古今主要的教育思想，並使人對這兩位教育家的思想有較概括的認識。

前言

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 年)是中國教育史上最為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對中國古代教育的發展有極重要的影響，被世人尊稱為萬世師表，亦是中國古代開創私人講學的教育家之一，其所建立的儒家學說自漢以後亦成為中國歷代教育和文化的核心內容，要學習和了解中國教育的歷史，就不能不對孔子的教育思想有所了解。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國近現代傑出的教育家之一，是五四運動以後具有影響力的人民教育家，他既批判中國傳統的舊教育，亦反對洋化教育。他所建立的生活教育理論和實踐，不單體現了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國情和時代特色，亦大大推動了近現代中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是影響當今中國教育發展的主流思想。

故此，要對中國古今教育思想有所了解，學習和認識孔子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看來是最起碼的。此文嘗試在描述兩者生平的基礎上，以比較的方法去分析兩者在教育主張、教學看法和教學哲學等三方面的異同，使人對這兩位中國古今教育家的思想有較概括的了解。

兩人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出生於春秋末期。孔子小時生活於當時文化中心的魯國，有“周禮盡在魯”的說法，這使孔子從小就受到西周傳統文化的薰陶，崇拜和嚮往西周教育與文化。他雖自小便立志當官，好學不倦；惜仕途不大順利。約於三十歲時，他看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故衝破學在官府的桎梏，投身興辦私學，實行“有教無類”。孔子亦曾率領弟子到過周、齊兩國，一面了解民生和政治；一邊以隨問隨答方式講學，指出“學而優則仕”，並提倡“仁”和“禮”作為做人和從政的道德標準。五十一歲的孔子回魯國作地方官，至五十六歲升為代理宰相，政績斐然；但亦因此被迫下台。於是他又專注教學授徒，帶領弟子周游列國，漂泊了十三年，及至六十八歲才返回魯國，自此以後便專心從事教育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的工作。後世所流傳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經；差不多都是經孔子搜集加工才得以保存。此外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有弟子三千多人。當中精通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者有七十二人。而《論語》一書則是其弟子輯

錄的孔子言行錄，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資料。

陶行知，原名文濬，後改知行、行知。他小時受惠於教會學校，至 1914 年畢業於金陵大學後，赴美留學；他初入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為杜威的中國學生之一。1917 年回國應聘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建議將“教授法”，改為“教學法”；並於 1926 年起草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書》，提出了“教育必須下鄉，知識必須交給農民”。他身體力行，一年後創辦了曉庄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實踐“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教育主張。1932 年又於上海創辦了上海工學團，以“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宗旨來辦教育，除了鼓吹學科學外，亦創立了小先生制和“即知即傳”的教育方法。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又於 1939 年在重慶，為難童創建育才學校以補償普及教育中的遺憾，提出培養學生做“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並提倡解放兒童的創作力。1946 年，他又建立重慶社會大學，提出新大學之道：“在明大德、在親民、在止於人民之幸福。”從他一生推動教育普及的實踐中，可見陶行知先生確實是中國現代史中最著名的人民教育家。

教育主張的比較

孔子和陶行知對教育有不少的主張，為了便於比較和分析，此文用教育哲學的角度將他們兩人的教育主張；歸納於教育的定義、目的、內容和社會功能四個方面。

從表一中發現孔子和陶行知都視教育為治理社會國家的一個重要手段，孔子提出庶富教治國三步驟，指出不教而殺謂之虐，肯定了教育對管治人民和國家的重要性；而陶行知則明確教育是為改造社會而設，他認為教育人，能達至天下為公的社會。但在教育的目的方面，兩者都有不同的側重。孔子所提倡的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是一套士人教育觀，帶領了不少後世儒家學者以做官為個人學習目的；反之，陶行知因有受西方平等文化的薰陶，加上面對日益衰落的中國社會，深感教育的目的是要讓所有受教育者能自主和明理，做自己和國家的主人。

表一：孔子和陶行知教育主張的比較

	孔子	陶行知
教育的定義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論語說文)	生活教育是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1939，見《文集》，頁 694)
教育的目的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 學也，祿在其中矣(論語衛靈公)	我們要教人，不但要教人知其然，而且要教人知其所以然(1936，見《佚文》，頁 99) 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國家的主人(1945，見《文選》，頁 306)
教育的內容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 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 主張習六藝六經	用活書、活用書、用書活(1935，見《文集》，頁 468) 主張教育要學習科學、創造和民主
教育的社會功能	“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國) 提出“庶”、“富”、“教”治國三步驟(論語子路篇)	教育為改造社會而設，為教育社會人才而設(1918，見《佚文》，頁 7) 教育為公，以達到天下為公(1945，見《文選》，頁 306)

至於教育內容方面，孔子因自小受周禮的薰陶，深感先賢古人的言行是榜樣，故主張以西周的六藝六經為教育內容；而陶行知卻是一名積極反對傳統八股的教育行動家，其所提倡活用書，讓學習者學習科學、創造和民主等都具備了創新的意義。最後，在教育定義方面，陶行知將杜威主張的教育即生活，改變為生活即教育；指出生活決定了教育的環境，實際的生活是教育的中心，而教育的意義亦在於改善生活，其教育的定義與生活緊密連繫；然而孔子的教育定義則只圍繞著教育的過程和目的，指出教育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並能使學習者得到增值的效果。當中一個強調教育與環境的關係，而另一個視教育為一獨立完整的過程。總言之，孔子和陶行知兩人的教育主張皆重視教育的功能和其目的性，然而在教育的定義和內容上，卻有所不同的側重。

教學看法的異同

在教學方面，孔子和陶行知都各有一套看法，當中孔子對教學的看法，為二千年來中國教師對教學的取向提供一個基礎。

根據表二，孔子在教與學的主張至今仍為教育工作者所樂道；他所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溫故知新、學而時習之、不恥下問和學思合一等教與學的方法和態度，皆適用於現今的教學環境，這充分體現出孔子一生在教學實踐的經驗和心得，是歷久常新的。而陶行知在教學方面的看法卻只側重與做的結合；他主張教學做合一，指出如何做，則如何教，亦如何學。並提出以即知即傳的方法來推廣教育；他亦不屑偽知識，故倡導教人求真學做真人。

至於孔子和陶行知對教師的取態，則有相近亦有相違之處。孔子倡導教師身教的重要，指出其身不正其令不行；並提出教師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而陶行知雖然要求教師要做改造社會的靈魂和教學生去學；但他卻突顯出師生的平等，提出師生要共教、共學、共做和共生活。此外，有關學生學習的作用和成果方面，孔子和陶行知亦有根本性的分歧。首先，孔子視人有高低之分，他期望學習者能透過教育獲得士人的道、德、仁、藝等特質；並提出教育對過高和過低的人來說是無效的。但在陶行知的心目中，所有人皆可受教，無分彼此，而每個人教育的成果是要人皆有民主和自治的能力，這與現代社會的基本需要是一致的。

最後，有關學校的看法，陶行知提出社會即學校，認為生活的環境亦是學與教的場所；這論點對當時中國教育的不普及和教育資源不足，是有積極的意義的。而孔子在春秋時代亦看到西周的秩序盪而無存，官員已不能把持教育，加上各地諸侯管治的需要，私學便隨之而起。事實上，孔子亦是推動中國古代私學發展的重要人物。綜合以上四個方面，孔子和陶行知在教育的看法，基本上是異多於同，要分析個中的原因，看來要從更高的層次比較孔子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表二：孔子和陶行知對教學看法的異同

教學	孔子論語	陶行知
教與學	實踐因材施教 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 學而時習之(論語學而) 溫故而知新(論語為政)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 教而好學，不耻下問(論語公冶長) 能近取譬(論語雍也)	教學做合一(1927，見《文選》，頁 284) 如何做，則如何教，亦如何學(1932，見《佚文》，頁 75) 即知即傳人，會的教人，不會的跟人學。不會教人的不配受教育。(1935，見《文集》，頁 449) 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1946，見《文集》，頁 821)
教師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	先生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而在教學生學(1919，見《文集》，頁 13) 教師稱為指導員，不稱為教員，指導學生教學做，與學生共教、共學、共做、共生活(1926，見《文選》、頁 281) 鄉村教師做改造鄉村生活的靈魂(1926，見《文選》，頁 277)
學生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	要教學生為民主的小學生(1946，見《文集》，頁 819) 想有能夠共同的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夠共同自治的學生(1919，見《文集》，頁 19)
學校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	社會即學校(1932，見《佚文》，頁 76)

教育哲學的分歧

要分析孔子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同的原因，要再深一層比較兩人的教育哲學觀(詳見表三)。首先孔子和陶行知對社會的看法是有根本上的不同的，孔子的理想社會是一個天下有道的社會，各人皆尊仁重禮；而社會的本質是一個差序的格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人皆有其定位，而應安份守己。但陶行知卻認為社會本質是變動及不可測的，其心中理想的社會，是一個大眾皆有幸福的社會；表面上，他好像與孔子倡導天下為公的理念是一致的，但本質上他倆對人是否生而平等有不同的取態，這不單突顯出中西價值的分別，亦體現出人類發展的成果。

表三：比較孔子和陶行知的教育哲學

教育哲學	孔子	陶行知
理想社會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論語禮運)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	大學之道在明大德、在親大眾，在止於大眾之幸福(1946，見《文集》，頁 538)
社會本質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	宇宙是在動，世界是在動，人生是在動(1934，見《文集》，頁 407)
知識論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重氏)	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1932，佚文，頁 75) 去與取，只問適不適，不問新與舊(1922，見《文選》，頁 275) 故欲求常新之道，必先去舊之方，試驗著，去舊之方也(1919，見《文選》，頁 271)
價值觀	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論語泰伯)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	沒有道德的人，學問和本領愈大，就能為非作惡愈大(1942，見《文集》，頁 723) 也只有肯跟老百姓學習的人，才能做老百姓的真正領導者(1946，見《文集》，頁 813)

至於知識論方面，孔子認為知識是客觀存在的，假若人對某事認識了便是知，而知的方法是從古籍和思考中得到的；新知識是孔子沒有考慮的課題。而陶行知的知識論正如他的名字行知，體現了知識和行動的結合，知識、實踐、新知識、再實踐是不斷累進的過程，當中他亦提出知識有新與舊和適與不適之分，這亦奠定了他敢於否定老師杜威所提出教學即生活的主張，而創建提出適合當時中國社會的“生活即教育”理論。在價值觀方面，孔子就個人高度提出了豐富的人本主義的價值準則，包括有修身自省、推己及人、重義輕利等高尚品格；而陶行知則以社會為出發點，主張以平民大眾的標準為準則，合乎大眾群體的規範便是有價值的人。

從上文可見，孔子和陶行知的教育哲學基本上是南轅北轍，是完全不同的。孔子的教育哲學整體上類近精華主義的取向，提倡應以古為鑑，學禮習仁以求仕的教育觀。而陶行知則較似重建主義的取向，認為透過教育與人和社會兩者的互動，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教人好學的民族，去創建一個中國人民大眾的新社會。

總結

孔子和陶行知都是生活於一個動盪的中國社會環境。孔子在面對春秋時代各地諸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狀況，他提倡仿古習周禮以重建社會秩序，這一方面推動了私學在中國的施行，另一方面又促進了百家爭鳴的學術風氣，但卻又無意間建立了影響中國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使教育成為歷代君王選士治民的工具。陶行知活在清末民初，整個社會既動盪又混亂，在去封建立新風和西風東來的年代，他一方面極力反對傳統腐敗的文化，另一方面亦反對洋八股的引入。他所與時代脈搏息息相關的教育試驗，創建了一套生活即教育的理論，既有中國的特色，又推動了全民教育觀的建立，他那種以教育人民，去改造社會的觀念，至今仍適合當代的中國教育。最後，孔子和陶知行的教育思想的不同，反映了他們受身處的社會人文環境所影響，而他們在中國古今社會的教育事業所作的貢獻是廣受認同的。

- 此文曾於 22-1-2000 在香港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舉行的「邁向比較教育研究會」中發表。
- 註：為使各讀者直接了解孔子與陶行知兩人的教育思想，各表列的內容皆直接引述兩人原文，當中有關陶行知觀點的年份是陶原文出處的年份。而所引述的文章則來自下列之書本
 1. 見文集為《陶行知文集》
 2. 見佚文為《陶行知佚文集》
 3. 見文選為《中國現代教育文選》

參考書目

- 毛禮銳、瞿菊農、邵鶴亭（1983）。《中國古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毛禮銳編（1987）。《中國古代教育家傳》。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王炳照、郭齊家、劉德華（1985）。《簡明中國教育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王炳照、閻國華（1994）。《中國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 伍振鷺（1987）。《中國教育思想史--先秦部份》。台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 江蘇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及市京曉庄師範陶行知研究室（1981）。《陶行知文集》。江蘇省：江蘇人民出版社。
- 何國華（1997）。《陶行知教育學》。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雄揮（1996）。《孔子的教育哲學》。台北：心理出版社有限公司。
- 孟宪承（1985）。《中國古代教育文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金成之編（1989）。《陶行知佚文集》。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
- 孫培青、李國鈞（1995）。《中國教育思想史》，第3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陶行知（1996）。《中國教育改造》。北京：東方出版社。
- 陶愚川（1985）。《中國教育史比較研究》。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
-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1989）。《中國現代教育文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董寶良編（1993）。《陶行知教育學說》。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